

1918年夏天。日本福冈的博多湾海岸。习习海风中,已经三年没回过祖国的郭沫若一边听着张资平介绍国内文学界的情况,一边忍不住叹着气,“唉!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那么,人呢?曾在预科同班的郁达夫、东大造兵科的成仿吾……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同仁的还是只有四个人,“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仁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六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见郭沫若《创造十年》)主张有了,张资平也赞成,接下来该去征求成仿吾与郁达夫的意见——这就是郭沫若所谓的创造社及其《创造》的“受孕期”,是一个将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高扬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的生命之始。

然而,“十月怀胎”期满,渴盼已久的宁馨儿却不曾如期降临。大家都着急,最沉不住气的是成仿吾。在他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迫不及待的情绪溢于言表:“新文学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似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终于,天边出现了曙光。1921年2月,成仿吾得到消息:上海泰东图书局改组编辑所,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有人推荐成仿吾任文学科主任。好事啊!成仿吾感到梦想与现实只差一步之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牢牢抓住这上天的赐予!于是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提前离校回国。郭沫若也立刻休了学,二人携手齐步登上了轮船。看着船头犁开万顷海水一路向前,他们“那时候委实感受着‘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所以不得不再经受一次好事多磨的失望:当他们兴冲冲抵达上海时,那把原本以为非成仿吾莫属的“文学科主任”交椅上已经坐上了别人。好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一个“充满着亢爽豪侠的燕赵之士”,那时虽然“正在穷困挣扎之中,深深地感到自己精力的衰颓,和书店经营的不得其法”(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但还是勉力接纳了他们,只是既没有发聘书,更没有发薪水。是因为安排两个人有困难吗?成仿吾想。于是主动离去,跑到长沙找了份工作糊口,把郭沫若一个人留在泰东伺机商谈创办文学杂志的事情。工作自然不会轻松,收获倒是颇为丰盛——赵南公到底接受了郭沫若的主张,答应出版纯文艺性的同仁杂志。

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一版上,赫然登出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末尾附带列举了“创造社同仁”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一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文学社团,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诞生了。多半年过去之后,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中,郭沫若对它做了这样的介绍:“我们这个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人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是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同时,郭沫若告诉那些愿意加入创造社的朋友:只要是赞成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优秀的作品”便是“超飞过

## 挖掘与勘探 内面世界的尝试 ——重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刘志荣

作为“五四”新文学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创造社一开始,就以声势凌厉的对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和骂战登上文坛。这种借由“攻击”吸引眼球的方式,在兹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后继有人,络绎不绝。此种方式的功过是非,时至今日,平心静气的史家已可了然于心,而其行为成就,终究也不可因此种种粗砺浮躁的而行方式所抹杀。

从历史的角度看,创造社对于新文学创作贡献最大者,可说有三:一是郭沫若狂飙突进的浪漫诗歌,一是郁达夫等开创的“自我抒情小说”,一是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实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这三方面,研究、论述者都很多,而对郁达夫等人开创的小说流派,则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如果从过去流行的看法稍微深入一步,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不仅在于泛泛而论的“人的发现”,更是着意发现、勘探与表现人的“内面世界”(这一内面世界,在当时作家笔下,又经常与外界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郁达夫等人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试以郁氏最富盛名的名作《沉沦》分析,它不同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尖锐的象征性叙述来表现自我与外界的截然对立,而更着力勘探内面的秘密世界,并由之呈现自我在世界中的某种紧张不舒适。

作为“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郁达夫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不管叫什么名字,甚至是历史上的人,“差不多都有作家自己或者作者的影子在里头”,联接起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部长篇来读”。(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2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一点上,《沉沦》也不例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郁达夫未完成的“自传”,尤其是其中的《雪夜》一章做比较,即不难明白其传记性的“本事”依据——从这一点深入进去进行“文史互证”式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不过限于篇幅,这得是另一篇文章处理的材料,作为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入手对这篇小說的重读,本文仅需指出:自传与小说到底是一回事,从自传性材料转换为小说,其中需要特定的形式转换,从而使得散乱而平铺直叙的材料,转换为特定的有机结构,否则,在自传性文本中可能感人至深的叙述式叙述,在小说文本中反而可能会显得没有着落。

《沉沦》的叙述一开始,主人公便处在“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他与世人中间似乎存在着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在下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道屏障之所以形成,大半的原因,来自于他自身相反相成的两种病症——“夸大妄想狂”(megomania)和“忧郁症”(hypo-chondria)。这两种病症,都可以看作人在青春期对外界不适应的症状,前者导致了他自以为是的“高人”、“隐士”的自大,后者又导致他自觉连凡人都不如的自卑,而通读全篇,主宰主人公心理

## “创造社”与《创造》

□张 丹

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便是与创造社“一块儿翱翔”的资格(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1922年3月15日,《创造》问世,因为担心稿件和编辑力量的不足而“暂出季刊”,约定待“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季刊共出6期,至1924年2月28日终刊。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该刊以创作为主,兼顾评论和译文,有创作、评论、杂录三大栏目。创刊号上登载的作品都是绝对重量级的,如郭沫若的诗歌《创造者》,戏剧《棠棣之花》第二幕,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张资平的小说《她帐望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儿女们》《写给谁的信》,评论《出版的道德》《创作》;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译文《淮尔特杜连格来序文》,论文《文艺私见》;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诗十六首》等等。

社团成立了,刊物也出版了,想做的似乎都做了,但郭沫若们的心绪却并不轻松,仿佛是交出了一份毫无把握的试卷,紧张而忘忘地等待着社会来宣布成绩的优劣。大约是《创造》出世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郭沫若和郁达夫小心翼翼地向南公打听杂志销路,得到的回答是“出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一句话如同迎面泼来的一盆冷水,让两个人都立刻感到了无人同情的悲哀。于是郁达夫喊起来:“沫若,我们去喝酒!”“好,我们去喝酒。”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最后一家是在青莲阁,两人直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酒楼,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郭沫若望月兴叹高声叫嚷:“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在那电光辉煌的肩膀碰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他两个孤另另的一样”。

那是一段最难挨的日子,所幸终于过去了。《创造》季刊以其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上的成就,不久即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日益强健着创造社的肌体鲜活着它的生命,使它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从而得以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到第二年,郭沫若结束了留学生活,郁达夫也离开了在安庆政治学校的教职,两个人先后抵达上海与成仿吾汇合,编辑力量顿时雄厚起来。三股绳拧成一股劲,创造社的前期活动由此进入了最活跃、最兴盛时期。撰稿人明显增多,除原有主力外,又添进了郑伯奇、田汉、陶晶孙、王怡庵、洪为法、邓均吾、何畏、淦女士、王独清、闻一多、梁实秋、冯至、徐志摩等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稿大量积存,季刊过长的出版周期已经成为它自身发展的桎梏。于是“季刊”换周报,运行速度大幅度提高。

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创刊号上刊登的《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可以看作该刊的宣言:“上帝,你最初

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所有这一切不快感,在小说进展的过程中都渐渐纠结到青春期的抑郁与性的苦闷这一点上来——也许正是因为性的强烈的吸引力与主人公性观念之间强烈的撕扯,最可以代表一个敏感而软弱的青年,在一个新异的世界里毫无指导地胡乱摸索所造成的那种强烈的紧张和不快感——而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缠绕到性的纠结中去的所有紧张不快感,最后又因为性的触媒舒展发散开来,成为滔滔不绝的议论,原也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他自我评价说:“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不过在当时,郁达夫的坦率的倾诉,确实吸引了一代青年读者——尽管从“时代病”的解剖与分析的角度看,小说的叙述并不能算成功,以致后来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过分伤感的作家——譬如夏志清就认为《沉沦》结尾时的自哀自怜,“这种文体暴露了最糟的矫揉造作的伤感”,不过他也承认:“可是惟其感情过分激动和微不足道的行动绝不调和,《沉沦》反而让人感染到一种神经质的紧张状态,抵消了小说里的伤感气味。”(夏志清:《郁达夫——〈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章),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5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诚然是一个伤感的作家,《沉沦》中的主人公,也确实动辄便“忽然生了万千哀感”,悲叹“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这种伤感似乎泛滥,不过,伤感的程度,也似乎能暗示出苦闷和不适的程度。本来,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无论是面对自我的新异变化,还是面对外部莫测的广阔世界时,单独来说,他都难免会产生面对不可把握的对象时的那种惶恐感,而当他面对的是这两者的纠结,尤其其他所要面对的外部世界,是一个自己事先毫无经验、祖辈和父兄也无法给他指导的异域现代世界时,他产生那种力不能胜任的强烈的软弱无力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沉沦》里,这种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和同样巨大弥漫的青春期的苦闷纠缠起来,其纠结不紧,难以自解,陷于软弱与毫无节制的伤感,也正是理之必然。主人公最后不能不自杀,从小说发展的逻辑看,在小说中原也可是不得不然的结局——而它在当时能感动万青年的心,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只是表现复杂的心理纠结,郁达夫的那种不加遮掩、一泻无余的叙述,并非最合适的方法。郁达夫自言,他的写作,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内心的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他也有他在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坚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疼痛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乐器的之音和洽不洽呢?”(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25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这固然可以说是灵机焕发,却也未始不是缺乏“叙述的自觉”的表现。《沉沦》结尾的“国族论述”,之所以读来觉得突兀,一方面与事先蓄势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叙述者的介入程度有关。蓄势不够的原因,郁达夫曾作过部分说明:“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谈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

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别人看过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缺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沉沦·自序》)不过这一顾虑,却使得小说的许多重要叙述线索失去着落,本来,在导致主人公忧郁症的内心纠结中,弱国子民的自卑感,社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从小说本文来看,描述得就太轻描淡写,而叙述者更指出,主人公所觉得的“歧视”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自己过度敏感的疑心,这使得这一叙述脉络几乎沦为滑稽。从叙述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如纯粹从主人公的内在视角来详细展开,效果会最为强烈——此可比较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小说,而现在的文本,旁观的接近全知的叙述者,时不时会突然跳出来插叙原因、分析主人公“他”的内心,但叙述得既不够翔实,分析得又不够复杂深

性:“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但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又显得是接受了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浪漫谛克的心,他在重压的呻吟之下寄寓着反抗。成仿吾又不同。他虽然也同样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实践上,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见于达人、王君《成仿吾传》)

自然形成的核心,自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郭、成、郁三人的政治立场、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创造社的性质、特点和命运。他们各自操纵着各自手中的一支笔,一起在创造社的旗帜上画上了三点标记:一是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二是创作方法上的积极浪漫主义;三是把自然科学运用于文艺“创造”中。这样做,并不是“硬要标新立异”,“故意和国内其他文学团体闹对立,而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见郑伯奇《忆创造社》)。因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们不是学医的便是学工的,或者学经济学法律,但他们又都自幼爱好文学,留日期间又都从不同渠道汲取了异域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发了创作欲望。不同的文学背景决定着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所以他们没有接受文学研究会的盛情相邀,而是异军突起般高扬起了另外一面旗帜。

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统治着一切。“三套车”奋力驰骋了一阵子之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感到了力不从心的倦怠——不仅是精力,更是财力。于是借着郁达夫接受北大聘书的机会,先把由三人合编的《创造日》停了刊,再用“缓兵之计”把成仿吾“承包”的《创造季刊》拖没了影儿。只剩下《创造周报》了,主编者郭沫若提议将其转至北京交给郁达夫,未果,便转给成仿吾,之后离开上海去了日本。成仿吾自知独力难成事,便在《创造周刊》第52号上发表了《一年的回顾》向读者告别:“……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也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重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是一种准备的作用。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哟,请等待着,等待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鼓鼓!”

他们的承诺是算数的。一年多后,他们果真东山再起,于1925年9月16日创刊《洪水》并发表《复活宣言》,又于1926年3月16日创刊《创造月刊》。《卷头语》上,他们宣布:“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品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该刊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轮流主编。虽然城头不曾“易帜”,但与事业初创时相比,此《创造》亦非彼《创造》了。

刻,导致小说在抒情、叙述和分析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充分和有说服力。郁达夫后来改弦易辙,常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创自我抒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也以这一方面影响最大,良有以也。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面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

丛刊2013年第3期目录	
文献史料研究	
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	吴兴华著、陈越译
吴兴华毕业论文的诗学旨趣 .....	陈 越
新发现《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 .....	沈卫威
粉饰逆伪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 .....	
——从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 .....	张先飞
林庚《新文学略说》校读 .....	郭国昌
冒名张恨水的小说伪作考略 .....	谢家顺、宋海东
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	
——纪念邵荃麟及“大连会议”五十周年 .....	小 鹰
左翼文学研究	
“划时代的作品”:抽丝剥茧读《春蚕》 .....	尹 捷
对一种“切分”丁玲的观点之反思 .....	鲁太光
论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成就 .....	章罗生
作家作品研究	
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 .....	李章斌
周作人美文写作的脉络及其文化意义 .....	朱晓江
严霁声的副刊编辑及其杂文写作 .....	石 娟
读解李晓桦的《蓝色高地》 .....	胡红英
张爱玲研究	
成长的故事:《传奇》的反浪漫叙事 .....	毕 婧
依然回首叙平生 .....	
——《小团圆》回忆叙事之一瞥 .....	黄阿莎
书 评	
寻找“鲁迅创造的鲁迅” .....	
——木山英雄《野草》研究的启示 .....	靳从林、刘颖异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开拓之作 .....	
——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	王士强
史料研究的重要收获 .....	
——评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 .....	杨萌芽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